

者通過與利奇的對話指出人類學在處理社會結構變遷時的無力感。這一無力感來自於現代人類學在結構功能論的影響下，強調社會文化結構核心地位時的尷尬，這讓傳統人類學研究在處理地方社會結構變遷這一命題時難以將來自王朝國家等方面的外在影響納入核心考量，導致其陷入平衡論的怪圈。另一方面，作者又通過對當地人如何用「生鬼」製造這一文化活動將王朝國家的勢力懸置起來的深入闡釋告訴我們，歷史研究中所謂王朝國家「禮儀下滲」之外存在的另一可能。正是在通過對不同學科的解釋框架和理解的反思中，作者展現當地人文化實踐的複雜性和社會歷史變遷的多面性。

跨學科的思路讓本書的內容豐富，分析問題的角度也多樣化，這無疑使本書獲得不可多得的啟發性。本書也存在一些瑕疵。例如作者期望以薩林斯定義的「事件」為切入點，重新解釋當地的社會結構和文化變遷，但是在具體的操作過程中，傳統史學意義上的「重大歷史事件」依舊是作者無法回避的。作者視為關鍵事件的「破姓開親」與王朝國家開闢新疆、木材貿易緊密相連，甚至是它們的直接後果。由此可見，把握「重大歷史事件」依舊是理解當地可操作性「事件」的前提，這並沒有從根本上撼動原有的研究路徑。同時，本書的民族志部份也明顯比史料解讀部份要精彩，結合全書的主題雖然無可厚非，卻也留下了些許遺憾。

黎家啟
雲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

**簡宏逸，《製作客家人：十九世紀傳教士的客家民族志》，臺北：
城邦印書館，2018年，205頁。**

客家方言群的歷史，長期受到漢語方言學、歷史地理學等諸多學科的關注。早在19世紀初，客家知識精英便開始建構客家方言群的歷史，這可視作客家研究的本土起源。清嘉慶年間，人地矛盾愈發劇烈，土客械鬥不斷。粵東和平縣人徐旭曾寫下《豐湖雜記》，細述客家人由何而來，並將客家方言群與「中原衣冠舊族」緊密聯繫起來。民國以降，「眼光向下」成為學界的新視野，在此背景之下，客家源流成為嚴肅的學術問題。1933年，羅香林出版《客家研究導論》，這被視作民國知識人基於現代學術規範進行客家研究的起點。

如今，客家研究勢頭仍勁，但對客家研究的學術史省思卻不多見。若要系統認識客家研究的早期學術史，王東與楊揚合著的〈客家研究的知識譜系——從「地方性知識」到「客家學」〉（《史林》，2019年，第3期，頁117-132）則不可不提。此文認為，19世紀初年，在土客械鬥頻仍的背景下，客家知識人開始自覺建構客家歷史。太平天國後，客家人為傳教士所留意，一批關於客家人的西文記述由此出現。基於前人的「元典建構」，黃遵憲對客家源流進行進一步的知識考古，使得客家歷史書寫更加豐滿。20世紀初，「種族」「民族」等話語流行開來，楊恭桓等客籍知識人從方言等角度論證客家族群是「優秀種族」。1920年代，民俗、歌謠、方言與戲曲研究成為學界的新課題。由此，客家研究正式走進中國學術界的殿堂。該文將19世紀至20世紀20年代的客家歷史書寫置於時代思潮與區域社會歷史的框架之下進行考察，回答早期客家研究誕生背景為何，有哪些學術成果與意義這三個問題。但西文學界早期客家研究的具體內容、學術脈絡，尤其是傳教士客家書寫的特徵及其學術淵源，仍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問題。

此書以歐德理（E. J. Eitel, 又譯作「埃德爾」「歐德禮」）的〈客家漢人民族志略〉（*Ethnographical Sketches of the Hakka Chinese: The Difference Races Inhabiting the Canton Province*）、〈客家歷史大綱〉（*An Outline of the Hakkas*）等文為例，深入研究傳教士客家歷史書寫的學術淵源，並對歐德理、畢安（Charles Piton）、黎力基（Rudolf Lechler）、何必烈（Friedrich Hubrig）等人的客家歷史書寫進行譯注，為讀者呈現出傳教士客家研究的基本樣態，展現客家研究除本土起源之外的又一源頭。

此書由序言、導讀及文獻翻譯三部份組成。在開篇之處，作者直陳其研究目的為搜集整理「客家/Hakka」概念形成初期的重要文獻資料，並研究歐德理等傳教士所撰客家研究論文在「19世紀學術和傳教脈絡中的地位」（頁6）。在作者看來，傳教士的客家民族志書寫（ethnographical sketches）應放在「東西文化相遇」與「基督教東亞傳教史」歷史脈絡中進行研究（頁6），譯注並分析這些文本能更全面地追溯「客家研究在學術系譜上的源頭」（頁68）。

在序言中，作者介紹其研究傳教士客家民族志的緣起。作者認為，歐德理等傳教士的客家民族志，是西方學界進行客家研究的早期實踐（頁6）。但具體面貌及其背後的學術脈絡並不為中文學界所熟知，這引發作者的研究興趣。作者試圖從「知識史」的角度出發，以歐德理的客家書寫為個案，展開對傳教士客家民族志書寫的研究。為呈現傳教士客家書寫的全貌，在本書

的「文獻翻譯」部份中，作者將歐德理〈客家漢人民族志略〉、〈客家歷史大綱〉，及畢安的〈論客家的起源與歷史〉(*On the Origin and History of the Hakkas*)、黎力基〈客家漢人〉(*The Hakka Chinese*)、何必烈的〈論客家漢人〉(*Über Die Hakka Chinesen*)等文逐一譯出。並翻譯漢學期刊《中國評論》(*The China Review*)中的〈客家民歌集〉(*Hakka Songs*)。

本書第二部份為導讀，題為「漢學家歐德理與他的客家研究：傳教士民族志學的視角」，共由第五章組成。此部份精彩地展現歐德理客家民族志研究的緣起、內容，分析德語民族志學與傳教士身份立場，是本書最值得關注的部份。第一章「歐德理的事業：宣教、政務、學術」，主要介紹歐德理的生平，其中重點論述歐德理早年求學生涯、在華傳教與參與香港政治事務經歷及其學術成就。作者據杜賓根大學檔案指出，歐德理曾求學於杜賓根大學新教神學院。學院的神學研究重視歷史實證研究法，同時受到黑格爾歷史主義的影響，重視基督教早期史研究，在研究中強調依據原始文獻，形成獨具一格的杜賓根學派（頁12）。歐德理曾修讀由杜賓根學派掌門人鮑爾（Ferdinand Christian Baur）開設的教會史與教義史等三門課程，其修習長達兩學年。此外，歐德理還曾修讀三學期阿拉伯語與體質人類學，作者認為這反映他對異文化的興趣（頁13）。1862年，歐德理受巴色差會派遣到廣東新安縣傳教，在此歐德理學習客家話。由於個人原因，歐德理轉籍至倫敦傳道會傳教，長期在廣州居住並至博羅縣傳教。在廣州，歐德理習得粵語。1870年起，歐德理投身政界，在港督堅尼地（Arthur Edward Kennedy）和軒尼詩（John Pope Hennessy）治下任職，主理香港教育事務。歐氏的學術成就集中於宗教、語言和史地等方面。在宗教與語言方面，1871年，其憑藉《中國佛教手冊》(*Hand-Book of Chinese Buddhism*)獲得杜賓根大學博士學位。1877年，他出版粵語詞典，次年又出版一部討論中國風水的專著（頁21）。歐德理還曾長期參與漢學雜誌《中日釋疑》(*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與《中國評論》的編輯工作，其〈客家人民族志略〉與〈客家歷史大綱〉即發表於兩期刊之上。在作者看來，歐德理早年學術訓練及長期在客家地區的傳教經歷，為其細述客家歷史作準備。

第二至第五章詳述歐德理客家民族志的主要內容並考辨其學術源流。作者指出，歐德理的客家民族志研究(*Ethnographical Sketch*)源自德意志學術傳統，他作為傳教士的身份立場，深深影響着其客家民族志書寫。

在作者看來，杜賓根大學的學術訓練使得歐德理能用歷史的眼光看待客家方言群的形成過程，以及客家民俗、方言與歌謠。而其客家民族志研究的

學術範式來自德語民族志學(Ethnographie/ Völkerkunde)的學術傳統，這一學術傳統可上溯至啟蒙時代。在15至16世紀，伴隨着新航路的開闢與文藝復興運動中「人」地位的提升，一批涉及各民族親屬關係、律法、儀式的旅行遊記與世界志開始出現（頁26）。在隨後的殖民擴張，出於統治的需要，歐洲諸國對殖民地的研究陸續展開。到了18世紀，這些成果彙聚到德國哥廷根大學，「將人類文化系統地分類整理」的民族志學在此形成（頁28）。在1808年，埃爾曼(Theophil Fridrich Ehrmann)撰成《普遍與特定民族志學大綱》，對德語民族志學進行整理（頁31）。作者經比較分析後得出結論，歐德理的客家民族志研究涉及客家人的播遷歷程、方言等內容，並重視客家人特質、風俗習慣與客家歌謠等民間文藝研究，這些研究主題均與埃爾曼《普遍與特定民族志學大綱》所列研究主題高度相關。在《客家漢民族志略》中，歐德理以兩個專章探討客家人的特質、風俗與習慣，這些內容尤為德語民族志學所重。由此作者得出結論，歐德理的客家民族志研究源自德語學術傳統。

在19世紀，德語的 Ethnographie/ Völkerkunde 與英文 Ethnography 可互譯，但歐德理的客家民族志與19世紀英語學術傳統中的民族志研究關聯不大（頁31）。在1839年，英國科學促進協會(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曾組織人撰寫「異民族觀察指南」。在1852年時，該協會與倫敦民族學會(The Ethn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一同主編《民族學訪問手冊》(A Manual of Ethnological Inquiry)，該手冊在傳教士中非常流行。據作者推測，在廣東傳教的倫敦會傳教士應有機會閱讀此書。但在作者看來，英語民族志研究傳統對歐氏的民族志書寫影響有限。如《民族學訪問手冊》非常強調對生命禮俗及建築遺跡的描摹，但在歐氏的客家民族志書寫中並未突出這些內容（頁36）。此外，歐氏曾花費大量筆墨描繪客家山歌，試圖以民歌認識客家人的心靈狀態，這部份內容可對應德語民族志學所重視的「禮俗與民俗藝術」，但英語民族志研究僅重視與「生命禮俗有關的詩歌」（頁36），對於其他類型的歌謠並不關注。這又可證明歐氏的客家民族志研究受德語民族志研究範式的影響較大。但作者亦指出，歐德理並非完全沒有受到英語民族志研究範式的影響。如其曾討論客家方言群與廣東省內各民族的關係，並分析這些民族的源流。這部份研究受到《民族學訪問手冊》中「外交與歷史關係」研究主題的影響（頁36）。

作者認為，歐德理的客家民族志研究帶有鮮明的傳教士漢學家特點。他以英格蘭史上三次移民潮來類比客家先民的播遷歷程，又以原意為古羅馬家庭守護神的 *lares rustici* 指代客家百姓的土地信仰（頁60），其以類比之法介

紹異文化，是傳教士漢學家常見的寫作手法（頁42）。歐德理認為客家地區女性無纏足陋習，一夫多妻與蓄養女奴現象較少，這一判斷顯然受到基督教價值觀的影響（頁51）。歐氏的客家歌謠書寫同樣反映出其傳教士的身份立場。在他看來，普羅大眾一般無法接受翻譯成文言文的聖歌與詩篇（頁53），傳教士必須先研究客家歌謠等口語文學，將傳教內容「穿上口語文學的外衣」，這樣更便於傳教工作的開展（頁53）。

歐德理對客家宗教的研究亦體現出其傳教士身份立場。在他看來，只有深入認識傳教物件的宗教體系，才能引導其改信基督教（頁56）。在歐氏看來，客家人信仰一神教，玉帝是民間信仰中的最高神祇，並認為客家人的一神教宗教實踐與基督教新教有相似之處。歐德理還以早期基督教發展史的書寫框架來建構客家宗教信仰。在基督教史敘述中，上帝(God)統領着各路主保聖人(patron saints)，這些主保聖人的前身是古羅馬時期家庭保護神(lares)。而在介紹客家宗教時，歐氏將玉皇大帝譯作God，將玉帝所轄的各路神祇轉化成主保聖人，由此可以看出歐氏的客家宗教信仰書寫具有「傳教士理想性的想像」（頁61）。

簡著亦指出歐德理客家民族志研究的局限性。作者指出，歐德理主要在廣東新安縣及博羅縣傳教，其田野範圍並不廣闊。在撰寫〈客家漢人民族志略〉時，歐氏正在博羅縣傳教，並常在廣州與博羅之間往返（頁39），其間並未到訪素有「客家大本營」之稱的嘉應地區。這導致歐氏的客家民族志並未能反映出客家百姓社會生活的全貌。作者還指出，歐德理的客家民族志書寫參考客家地區的口頭傳說與族譜，但並未對內容詳加考辨，導致其「諷刺地建立了客家人的遷徙神話」（頁64）。

綜上可見，此書依託杜賓根大學檔案史料還原歐德理早年學習經歷，並細緻分析德語民族志學傳統對歐德理客家民族志書寫的影響，基本勾勒出客家研究的域外之源，是一部值得關注的學術著作。

總的來說，此書仍有如下兩處值得商榷之處：

其一，比較研究視角略顯薄弱。在歐德理之前，巴色會長期向客家人傳教。傳教士郭實臘(Rev. 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aff，又譯作「郭士立」)致信同僚時即曾論及客家方言群，傳教士韓山明(Theodore Hamberg)曾撰有《太平天國起義記》(*The Vision of Hung-Siu-Tshuen and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並編有《客英字典》，傳教士黎力基曾編有《客英詞典》。如作者所述，語言研究向來為德語民族志學所重視，歐德理亦曾比較研究官話、粵語與客家話。那麼，歐德理的方言研究與其他傳教士相比有何不同，

作者在書中似乎並未明示。此外，如黎力基、何必烈、梅輝立（W. F. Mayers，又譯作「梅輝拉」）等人均論及客家歷史源流，其與歐氏的觀點有何差異，敘事模式有何不同，亦值得進一步研究。

其二，部份觀點仍值得細緻推敲。在作者看來，歐德理運用民間史料分析客家源流的研究路徑為羅香林所承襲，「其推理邏輯與歐德理完全一樣，甚至可說只是在歐德理的框架上進一步補充材料而已」（頁43）。比較羅香林的《客家學導論》與歐氏的客家民族志，二者在敘述客家源流之時，確有許多相似之處，但羅著在回顧客家研究史時，不僅提及歐德理（羅譯作「哀德爾」）的〈客家人族志略〉與〈客家歷史大綱〉等域外客家研究著述，亦提及徐旭曾、黃釗等客家知識精英的客家歷史書寫。如上著述中的客家源流敘事，基本邏輯均是客家先民自北方遷來，承傳中原舊俗，方言保留中原古音，且多在開篇解釋「客家」為何得名。若說羅香林受到歐德理敘事框架的影響，恐怕仍需更多的證據。

儘管如此，這書為學界揭示客家研究的域外之源，填補研究空白，使得客家研究學術史的整體面貌更加完整清晰，是一部集理論性與資料性為一體的著作。這部著作無疑豐富客家研究的知識系譜，為研究海外客家學術史提供新的增長點。

李瑞璞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費晟，《再造金山：華人移民與澳新殖民地生態變遷》，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472頁。

作者廣泛利用澳大利亞官方檔案、中外民間史料、口述史及物質文化研究成果，從移民環境史的視角詳盡考察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華人移民在澳大利亞、紐西蘭的生產生活，特別是華人移民參與農牧礦產業以及與歐洲移民群體互動的細節，揭示華人對澳新殖民地生態與社會變化的影響與意義。本書的重要觀點是，近代中國利用英帝國的貿易網路與南太平洋地區產生經濟和生態聯繫，隨後的華人移民則強化這種聯繫，使中國因素更直接有力地參與南太平洋地區生態與社會的整體變遷，而華人強大的環境適應性和改造力也刺激歐洲移民的生態焦慮，這最終加速種族主義的排華話語及政策在殖